

JIEBUKAIDE GEMING QINGJIE

# 解不开的 革命情结

——王蒙小说的思想轨迹

吴三冬 著

北京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

新文苑丛书

解不开的革命情结

——王蒙小说的思想轨迹

吴三冬 著

北京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不开的革命情结：王蒙小说的思想轨迹 / 吴三冬著。北京：  
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2.6

(新文苑丛书)

ISBN 7-80554-423-9

I . 解... II . 吴... III . 王蒙—小说—文学研究

IV . 1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6773 号

**新文苑丛书**

**解不开的革命情结**

JIEBUKAI DE GEMING QINGJIE

——王蒙小说的思想轨迹

吴三冬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6.625 印张 20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80554-423-9

总定价 (共四册)：60.00 元

## 序

王蒙的小说没有读过，不过这位作家的名字已经熟知近半个世纪了。那是在难忘的 1957 年，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使他成为右派，从此名满天下……看来，“解不开的革命情结”这个论题似乎切中了王蒙的要害，并超越了对一位作家的专论而有着更广的意义。故在此借以发表一点“革命”议论，不怕贻笑大方。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于 1985 年写了《科学革命》一书，其中第 4 章专门论述了“‘革命’概念的转变”。拉丁字“革命”的意思是一个天体绕着一个轨道旋转的运动，开始用于科学（天文学和几何学），转而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革命是当今时代的特征”，那是在 1985 年的《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一文中指出的：“世界上众多的文明地区在 1750 年左右开始置身于一系列动乱和灾难之中（动乱和灾难不是西方文明的专有物）。我们至今也还停留在这个状态。”20 世纪上半叶，政治革命压倒了科学革命；后半期，特别是最后二三十年，科学技术革命压倒了社会革命。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对右派的定义是“反革命”。所说“王蒙的小说没有读过”是指他后来的革命小说，

11/35/05

除那篇有争议的《坚硬的稀粥》外一本也没有读过，那篇右派“反革命”小说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王蒙实际上是从中国革命夺取政权阶段胜利以后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这一历史时期，首先是世界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冷战”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左派”运动与中国的“文革”，接着便是连接着世纪之交的“后冷战”时期。上一世纪的最后20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之错综复杂性超过了大革命时期的单一性。一方面是反思本世纪的革命，另一方面把这种反思推向近代史。这就是说，一方面是从批判、否定“文革”到反思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另一方面是反思整个启蒙主义的思想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两个反思相互“咬”上了“尾”：一个是对着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是对着资产阶级革命。

为什么说辩证法是革命的？为什么说历史的辩证法又是无情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消灭之前，奴隶打倒主人，自己又成了主人；把皇帝拉下马的人变成了皇帝；专摸老虎屁股的人变为老虎……这样的事每时每刻都在世界上发生。这有如鲁迅所说：“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也就是“革命”这个字最本真的意义——“天旋地转”。一个“小革命”到了组织部就因为爱给“老革命”提意见，就成“反革命”了。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似乎也很简单，那么一“站”就站过来了。所以“文革”时老百姓说：“干不完的革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文革”也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也批判了，从此不必写检讨了，也没有眼泪可流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的日子还要好”，“幸福生活万年长”……于是干脆，整个人类“解放”作为历史的“宏大叙事”都被消解了。但是社会学有关方面的调查问卷透露，在中国“先富”阶层的一部分人们总是感到被周围的人们“仇恨”，并且同样的社会学调查也表明：中国多数人认为“先富”者里面相当大的部分不是靠合理、合法手段致富的。虽然那些时时怀着恐惧感的富人并不一定都是“为富不仁”。至少，赖昌星之类在他们事发前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们靠罪恶得来的钱，绝大部分用于贿赂（据说接近上千亿的黑钱他们只落下二十几亿给自己）。他们有一句名言，不怕共产党的“官”们不就范，“只怕他们没有爱好”。人们对“9·11”事件的普遍认识是：世界贫富两极分化是恐怖主义的最深层的基础。他们不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他们的“好日子”未必真会“万年长”。所以，“革命”走了，会不会更坏的东西“来了”呢？旋转，旋转……

汉字“革”在《说文解字》里有两个意思，一是兽皮去毛；二是“三十”，意指“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我想这两个意思是相通的。《易经》中对“革”卦的释辞为“天地革而四时成”，这在语源上与西方的意思是

一致的，即从宇宙运动造成的自然节气的变化解释“革”。在中国古代哲学看来，无论在宇宙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革命”都是必然规律，即“卦辞”所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所以不对少數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社会结构说 bye，只对“革命”喊 bye，恐怕有点“逆天违人”了吧？

“顺天应人”之事是“神圣的、崇高的”，于是“后革命”氛围中才有“亵渎神圣，躲避崇高”。“赋得革命，七言八韵”。因为谁都唱“革命”这本经，于是“痞子”文学：“一点正经没有”……

也是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毛”，统治阶级是“皮”，统治阶级被打倒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附”在新的皮上。所以对文人言，总是被从这张“革”上薅下来，贴在另一张“革”上，成为“皮”。

“革命”这个“结”之“解不开”，是个“死疙瘩”。这个“疙瘩”死了烧成灰，还是“革革革”……

我想在一个非“哄炒”即“酷评”的“后批评”时代，竟然有人来“解”这个“解不开”的“结”，而且是一个不小的“结”，应该要有点类似“革”的胆识的吧。而没有读过一本革命小说，却为一部论革命小说的书作序，也算是够“革”的了吧！

毛崇杰

2002年春，百望山前

责任编辑   解重庆  
封面设计   于蕊

## 目 录

- 第一章 革命情结。神化自我、无我，树立权威、整合一切的努力——《青春万岁》。权威话语的自我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 (1)**
- 第二章 对被解放的感激。相信、理解、谅解新的现实和权威。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对权威的质疑。怀疑和相信——《悠悠寸草心》、《蝴蝶》等等。 ..... (12)**
- 第三章 对怀疑的回应和反击——为革命辩护，相信历史必然性——《如歌的行板》与《相见时难》。 ..... (29)**
- 第四章 对现实积弊和人性弱点的揭示与宽容。“不会被任何人怀疑我写他”。讽刺的消解。沉浸于自我智力的优越和语言的游戏——《莫须有事件》和《风息浪止》等等。王蒙的意识流。 ..... (40)**
- 第五章 在不伤及政治权威的前提下对无行文人的嘲弄——《黄杨树根之死》和《深渊》等等。 ..... (57)**
- 第六章 对现实的满足和不满。物质的、实用的现实与精神的、诗意的幻觉的矛盾。迁就现实、实现不了自我的惶惑、痛苦——《名医梁有志传奇》、《惶惑》、《高原的风》。冲破“规范”、实现自我的冲动与对分寸的把**

握——《青龙潭》、《湖光》、《高原的风》、《风筝飘带》中的青年形象。	(64)
<b>第七章</b> 权威视角下对“不正之风”的揭示批判——《要字8679号——推理小说新作》和《夏之波》。对当领导当权威的痛苦和难处的表达——《十字架上》。	(74)
<b>第八章</b> 看开些，再看开些。“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解脱的追求——系列小说《在伊犁》。	(83)
<b>第九章</b> 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倪吾诚形象的意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革命者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视角——《活动变人形》。	(105)
<b>第十章</b> 对过去岁月的追忆与思考。爱的异化、错位和失语。对特定群体激进革命的反思。钱文的心路历程——革命、改造、失态、踌躇和逍遥——“季节四部”。	(135)
<b>后记</b>	(200)
<b>主要参考书目</b>	(202)

## 第一章

革命情绪。神化自我、无我，树立权威、整合一切的努力——《青春万岁》。权威话语的自我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创作于 90 年代的《恋爱的季节》中有一段写主人公钱文之所以“从小就痛恨旧社会，就盼望暴风雨，就期待革命的铁锤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他所以天然地趋向革命，趋向左倾，趋向于激进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第一位的原因恰恰是他的父母的争吵斗殴，这太可怕了。他恰恰是从他的父母的仇敌般的、野兽般的关系中得出旧社会的一切都必须砸烂，只有把旧的一切变成废墟，新生活才能在这样砸成粉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耸立起来的结论”。无独有偶，《活动变人形》中的倪藻，当他在德国他父亲的老朋友史福岗家“接上了一段断截已久的胶片”，又寻觅到他童年生活的遗迹时，他感到更有把握回答侨民赵微土关于“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进步要这样难，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呢？少付出一点代价，不行吗？”的提问了：“为了改变他童年时代领教够了的生活，这一切的代价，也许并不算太高。”而倪藻所谓的童年时代领教够了的生活同样是他的父母的争吵斗殴，这是《活动变人形》的最主要的内容。显然，无论是钱文还是倪藻都有着王蒙本人的身影。王蒙是把《恋爱的季节》当作他

的精神自传来写的<sup>①</sup>，而《活动变人形》按照王蒙自己的说法是他的切肤经验<sup>②</sup>。据王蒙夫人方蕤说：“幼年的王蒙，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家里的纠纷，父母的不和，源于文化素质、生活情趣、新旧观念、待人接物……反正说不清的差异，令夫妻关系到水火不相容的境地。再加之家庭成员组合的畸形：他的外祖母、母亲、姨母组成联盟，和他那单枪匹马的父亲抗衡。有一回，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正从院中往室内走来，迎接他的是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从室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倾盆泼出。无疑，这惊心动魄的残酷事实，在王蒙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我跟他相识以来，他从不轻易说起这些，而每每说到这种话题时，他很痛苦，我也为他难过。小小年纪的王蒙，怎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苦难！”<sup>③</sup>这里所说的泼绿豆汤的情节几乎原封不动地写到了《活动变人形》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钱文和倪藻就是王蒙，是艺术化了的作者自我形象。

如果说每个人在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由于幼稚、软弱和不成熟都必不可免地有着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强烈依恋、依靠的话，那么，当小小王蒙因父母的相互仇恨和争吵而感受到深深的失望和巨大的痛苦时，革命及其领袖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地替代了当年王蒙的父母成为王蒙的依恋、依靠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有着父母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有力。起码在王蒙心目中革命做到了摧枯拉朽，把包括他的家庭在内的整个社会翻了一个个儿。钱文因与地下党领导人沈大哥失去联系所感到的痛苦——“说是像断了线的风筝，说是像失去了慈母的孤儿，说是像离了群的孤雁，说是丧失了生活的意志、意义、决心和信心，这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其词的啊”，我以为是真实地表达了王蒙当时这种强烈的依恋心理的，你甚至可以说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王蒙的一种情结，一种革命情结。

但是，如果说一个从小过于依恋、依靠父母、一个从小受到父母过分的溺爱和庇佑的人，他以后将很难走向真正的成熟和独立，那么，王蒙在他的童年对革命及领袖的这种强烈的依恋和期待，对他意味着什么，尤其对他以后的创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他生命最初的四五年之间，他的人格已经成形，“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趋近目标的方式、他的情绪倾向等等，也都已经固定。以后它们虽然也可能改变，但在改变它们之前，他必须先从儿童期固定成形时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sup>④</sup>当然，说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其人格即已成形也许有失偏颇，未必一定科学，但中国老话常说的三岁看老却是与阿德勒的看法极为接近的，因而它起码说明了一个人童年生活对他一生的极端重要性。

在某种意义上，当人自以为能够把旧的一切变成废墟，并能够在这废墟上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时，他就把自我理想化甚至“神化”了。王蒙写于 50 年代的他的第一部长篇《青春万岁》就带有这种神化自我的倾向。当然，这个“神化”的自我不是具有独立个性的自我，而是去除一切私心杂念把自我的一切全都献给组织、集体和社会的自我。这个自我其实是无我。《青春万岁》实际讲的是献身、牺牲，为整体社会改造工程，为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献身、牺牲。作品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还是中学生的郑波在百货公司遇到了她革命的第一个领路人黄丽程，黄丽程把自己身边的顾明介绍给郑波。郑波凭顾明对丽程的亲昵称呼，就知道丽程有了爱人，并且看得出来他们很像是来筹办结婚的用品。但这念头却使郑波烦乱或者说郑波无法理解黄丽程为什么要结婚要筹办结婚用品，“丽程是不应该有这种平凡的、俗气的事儿的。郑波不同意，这想法也许可笑，但她不同意”。的确，在献身、牺牲的意义上，结婚包括筹办结婚用品这类事儿都太个人化太有我因而都太俗气了，因此，包括结了婚的黄丽程在

某种意义上都不能不接受郑波的看法或者说是批评。当郑波问：“告诉我，黄丽程，你为什么要结婚？”“我觉得你是一个职业革命者”时，黄丽程说：“难道结了婚我就变成职业新娘子吗？”“我知道你担心我结婚以后生活庸俗起来，这样的女同志不是没有，但我不会！”在黄丽程看来，“要永远记住我们最初走向革命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不仅是在战斗中，而且要在和平建设中，不仅在冲破宪兵包围的时候，而且在烫着头发的时候（她撩一撩头发）都有一样的火热的斗志”，而正是由于对黄丽程结婚的不理解、“不同意”，才使郑波压抑了自己的初恋情感。曾镇南在他的《王蒙论》中这样评论郑波对田林的拒绝：“这里也许有时代的理性主义因素的制约，有需要宁静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的自觉的律令；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在作为人的成熟程度上的差异，使郑波内心没有产生类似田林那样深沉的爱的感觉。”<sup>⑤</sup>“正因为郑波的内心没有产生那种强烈得要冲破理性的约束的冲动，所以她在潜意识中直觉到这样的初恋发展下去，是既不会幸福也不会持久的。‘但那不是我的，还不是我的！’郑波用这种坚决的想法平服了自己心灵的不安。”<sup>⑥</sup>但如果一个人的理性约束强大得压抑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她怎么还能产生那种冲破理性约束的冲动？而郑波在作品中不正是一个过分理性化的人吗？在作品最后，当郑波同意了学校的安排留校做教师时，校长问她：“可是，促使你这样决定的，沉重的义务感比事业的吸引力强，对吗？”“郑波想一想，老实承认：‘是的。’”。作品这样介绍郑波们：“她们肩上承担起来的是数倍于一个普通年轻孩子能够挑起的分量的担子，她们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的浪漫主义气质：整宿整宿地开夜车，三个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边，把饭钱借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经常检查思想，每天记日记。翻开她们日记本的红漆皮，翻过毛主席像，她们往往用一种成人的行书体写着最喜爱的书上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

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他可以骄傲地说：我已经把我的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所做的斗争。”包括没有得到学习奖章，郑波都能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得不到奖章，其实没什么。但解放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在各种场合里，郑波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头做好该做好的一切，总是无愧地号召和督促别人前进。这次，在平凡的和主要的学习任务面前，没有保持住光荣，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团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会不会被看作说空话的‘先进分子’呢？”她下定决心：“我要勇猛顽强地学习，像大炮、像坦克一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思想“高度”，这种革命的理性，郑波才不同意黄丽程的结婚，那么她拒绝刚刚到来的自己的初恋不是很自然或者说不就是一种必然吗？不能说田林没有触动郑波的内心波澜，当参加完黄丽程的婚礼与田林一起在初雪中散步时，郑波心里曾充满无限的柔情，“感到生存在这样天空下的幸福”，这是被曾镇南称为“实际上像薄雪花一样的初恋的感觉”<sup>⑦</sup>。而当她写信拒绝了田林后，田林请她到自己这里来，看到田林那样的平静，郑波心里反而感到不好受。本来，郑波应该为田林的不平静感到不好受，因为她的拒绝造成了田林的痛苦，但现在却反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郑波看来，田林的平静说明他实际上对自己没有感情，郑波因此不好受恰恰说明她对田林有感情。但郑波确实是太“成熟”了，她几乎还是个少女，竟能用理性制约住自己的初恋情感。和她相比，田林确实是在“成熟”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成熟程度上的差异。当然，也许田林确实还不是郑波的，就是说田林对郑波的触动还没有强烈到足以使郑波冲破理性的约束。但我以为，那个能够使郑波冲破理性约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是找不到的，因为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对于人的要求了。

除了郑波和田林，作品还写了杨蔷云和张世群的爱情，但同样以一方拒绝另一方面结束。郑波拒绝了田林，张世群拒绝了杨蔷云。杨蔷云和张世群的爱情与郑波和田林的一样，也仅仅处在一种萌芽状态，你甚至可以说杨蔷云的爱情仅仅是心理的，是隐藏在心里的，她还没来得及向对方表达，就结束了。如作品所说：“一种宝贵的不可言喻的感情的萌芽在还没有被她自己了解的时候，就破灭了。”但是，如同杨蔷云感到结束的突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感到结束的突然。在颐和园两人相会那一节，当张世群对杨蔷云说“我现在有了一种……幸福，也许是……很幸福”时，我们大概都会认为两人的关系已经水到渠成了。的确，如果说相爱的话，两人起码已经相知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无论是性格是趣味似乎都很相投，但张世群后面的话却是，“我认识了一个同班女同学，我们非常好。也许是我瞎想……真是发疯啊，怎么办呢？”这使杨蔷云觉得张世群突然远远地离她而去了，“大”了，“而她悲苦地觉到自己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那么，王蒙为什么给两人的关系突然划上了休止符呢？郑波在拒绝田林的信中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点也许是有帮助的：“我还是个孩子。旧社会的困苦耽误了两年的学习，现在才上高三。祖国的伟大的建设刚开始，对青年的要求是高得无比的，而自己的知识是这样贫乏、可怜，即使咬着牙每天念二十四小时的书，我也觉得还差很远，又怎么能谈到别的呢？”某种意义上，王蒙是在用郑波的理性的眼睛看待杨蔷云和张世群的爱情，或者更正确地说，郑波理性的眼睛其实就是王蒙理性的眼睛。在写于1978年10月的作品后记中，王蒙在谈到那时的青年与现在的青年的不同之处时特别说到，“还有当时在男女同学的交往中萌发的一些朦胧的、自然的、却是应该加以引导的情感”，显然，在当时的王蒙看来，杨蔷云对张世群的情感属于虽自然却是应该加以引导的情感。杨蔷云和郑波一样才上高三，处在像郑波认为的

应该为祖国的伟大建设而努力学习知识的年龄，但如果说郑波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因此能够自觉地抑制自己的爱情，那么杨蔷云显然没有郑波那样的理性自制力，她比郑波更洒脱，也更任性，更好冲动，如果任她的感情自然发展，很可能会冲破理性的堤岸，很可能会为爱情而爱情。而王蒙的青春万岁并不是爱情万岁，也不是激情万岁，而是献身万岁，牺牲万岁。有我必须变成无我，爱情或者激情必须被纳入献身、牺牲的轨道。所以，王蒙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爱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李春在演讲比赛的试讲中说到，“学习的动力在哪里呢？是在于得了一百分换取爸爸妈妈的夸奖，还是在于以‘为了祖国’这一口号激发爱国主义的良心？”“不，不是这样。推动我们学习的，在于对于知识的渴求”，即要为知识而知识时会受到同学们的“没有把科学与对国家建设的作用联系起来”的批评。而结了婚的黄丽程要对郑波特别强调，不仅在冲破宪兵包围的时候，而且在烫着头发的时候都有一样的火热的斗志。

在郑波对自我的严格或者说严酷中，我总觉得隐约有着某种专制的倾向。因为对于郑波这决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个人修养，它包含树立权威的努力，正如上引她对于没得到学习奖章的认识：“作为一个团分支书记、共产党员，往后，她怎么‘动员’别人努力学习呢？”这里，动员或者号召、督促别人实际上是动员、号召、督促别人和自己一样为革命学习，成为郑波学习实际上也是郑波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和主要目的。因而学习或者学习好已不是自我发展、实现的需要，而仅仅是为了争得某种权力某种话语权力的需要，而这显然是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否认世界上多种价值观存在的合理性，只承认自己信奉的价值观是惟一合理的价值观，所以，这种价值观不是努力使他人保有尽可能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而是无一例外地要把别人纳入自己的生活轨道，信奉自己的价值观。所谓革命，正是要整合一切，